

朱熹《楚辞集注》初刻考辨*

唐 宸

内容摘要:朱熹《楚辞集注》是中国文学史上的重要著作,其初刻时间,学界一般认为是朱熹在世时的庆元四年,并以日本大正三年《内阁目》和南宋《中兴馆阁书目》的著录作为依据。本文考证认为:大正三年《内阁目》未著录庆元四年本《集注》,转抄者误抄《内阁目》中的庆安四年本为庆元四年本,《楚辞书目提要》沿袭此误,近年出版的重排本《楚辞书目提要》又将嘉定四年本的行款混入本不存在的庆元四年本条目中,遂使学界再度产生误解;《中兴馆阁书目》成书在《集注》之前,故不可能著录《集注》,民国赵士炜《中兴馆阁书目辑考》误辑了《玉海》中有关《集注》的文字。所谓的庆元四年本《集注》其实是不存在的,《集注》在朱熹在世时并未刊刻流传。台湾所藏嘉定四年杨楫刻本,才是《集注》的初刻本。《集注》的成书和刊刻是“庆元党禁”到“嘉定更化”这一特殊历史时期朱子学境遇改变的反映。

关键词:《楚辞集注》 初刻本 《中兴馆阁书目》 庆元党禁

朱熹(1130-1200)《楚辞集注》八卷(附《楚辞辨证》二卷、《楚辞后语》六卷,以下分别简称为《集注》、《辨证》和《后语》),是中国文学史上的重要著作。学界一般认为:受到赵汝愚(1140-1196)罢相谪死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朱熹晚年开始寄意《楚辞》,通过注《楚辞》来抒发内心忧国怀人的郁志。他的《集注》和《辨证》,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问世的,而《后语》则至临终仍未完成。关于《集注》和《辨证》的成书时间,学界曾有不同的看法。早在1953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影印宋理宗端平二年(1235)本《集注》时,郑振铎先生曾撰文认为:《集注》完成于宋宁宗庆元元年(1195),《辨证》完成于庆元五年,二书存世最早的版本是宁宗嘉定六年(1213)合刻本^①。此说影响较大,随

* 本文写作受“浙江大学人文社科专业博士生境外交流专项基金”资助。

①郑振铎:《一九五三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影印宋端平本跋》,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编:《朱子全书》(修订本)第19册“《楚辞集注》附录”,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10年,第333页。

后出版的各种整理点校本多从之。然而,束景南先生《朱子大传》通过严密考证,认为郑先生的观点实出于误解,《集注》应是“在庆元二年才开始动笔写的”,“完稿是在庆元四年冬间”,《辨证》则“成于庆元五年春间”^①。崔富章先生《楚辞书录解题》也认为“《辨证》二卷,完稿于庆元五年三月”^②。经过束先生和崔先生的考证,《集注》和《辨证》分别成书于庆元四年冬间和庆元五年春间,《后语》为未成之书,应无疑问。

那么,《集注》的初刻时间是何时呢?当年郑振铎先生所能经眼的版本还很少,遂认为存世最早的是嘉定六年本。后来姜亮夫先生《楚辞书目提要》著录了庆元四年本一种,崔先生《楚辞书录解题》又著录了嘉定四年本一种,此二种时间都早于嘉定六年本,而且已被学界普遍认为是《集注》两个最早的存世版本。庆元四年本因为刊于朱熹在世时(朱熹卒于庆元六年),似是《集注》理所当然的初刻本,姜先生就曾以此版本为武器,针对前代楚辞学者毛以阳、朱冀和王邦采等人对《集注》真伪的怀疑,提出了反驳意见:

庆元四年戊午刻本,明见日本大正三年《内阁目》,则熹生时已板行矣,而嘉定四年门人杨楫已刻《辨证》于同安郡斋。今传本尚有嘉定六年、端平二年、咸淳三年诸本,岂容作伪?^③

可见,日本大正三年(1914)《内阁目》,是姜先生著录庆元四年本《集注》的主要依据之一。此外,姜先生在《集注》的“目录著录”项中列举了后世目录对《集注》的著录情况为:

熹《本传》:“著《楚辞集注》。”

《宋史·艺文志》:“朱熹《楚辞集注》八卷,《辨证》一卷。”

《中兴馆阁书目》:“朱熹《楚辞集注》八卷,《辨证》二卷,《后语》六卷。”

注:“晁补之《续》、《变》二书各二十卷,熹刊补定著五十二篇,为《楚辞后语》。”《玉海》五四引

《宋史》成于元代,《宋史·艺文志》(以下简称“《宋志》”)及朱熹本传对于考辨《集注》的早期流传情况意义并不大。唯有《中兴馆阁书目》是南宋官修之书目,其主修者陈騏(1128-1203)与朱熹同时,可作为《集注》初刻时间的线索。

因此,庆元四年本作为《集注》初刻本的依据有二:大正三年日本《内阁目》的直接著录(除此以外中国历代目录都未著录),以及《中兴馆阁书目》的早期著录。这一观点,已经普遍为学界所接受。目前笔者所见的涉及《集注》的

①束景南:《朱子大传》,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1046页。

②崔富章:《楚辞书录解题》,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年,第63页。

③姜亮夫:《楚辞书目提要》,《楚辞书目五种》,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61年,第42页。今按,嘉定四年本是《集注》、《辨证》合刻本,而不是《辨证》单刻本,说详下文。

专著和论文(包括一些名为“成书考论”和“版本述略”的论文),以及各种整理本的前言,也都以庆元四年本为《集注》的初刻本(早年的一些整理本则多沿袭郑振铎先生旧说)。然而,庆元四年正是诏禁“伪学”、庆元党禁十分森严的时刻,朱熹的著作真可顺利刊刻吗?带着这个疑问,本文拟对《集注》的初刻情况进行详细的考辨。

一、大正三年《内阁目》未载庆元四年本《集注》

姜先生《楚辞书目提要》中对《集注》庆元四年本的著录为:

宋庆元四年戊午刻本。日本大正三年《内阁目》。^①

“《内阁目》”是省称,全名应为“《内阁文库图书第二部汉书目录》”,系日本内阁文库官方藏书目录,由日本内阁书记官室记录课编纂,帝国地方行政学会大正三年十二月出版发行。因为远在异域,我国学者历来罕有知见者。胡适先生就曾感叹说:“内阁文库书目一册。此本流传甚少,虽狩野博士(引者注:狩野直喜)亦未得此本。我去参观时,托岩村成允先生再三求请,始得此册。”^②不久前,笔者获知日本国会图书馆网站已将一批版权超出保护期的馆藏影印上网,遂往查阅,发现这部《内阁目》也在其中^③。经查,书中第323页至325页为集部“楚辞”类,类下著录图书共37种,其中有关《集注》的10种:

《楚辞集注》八卷《辨证》二卷,《后语》六卷,宋朱熹。天历三年刊。

《楚辞集注》同上,成化十一年刊。

【特】《楚辞集注》同上,明版。

《楚辞集注》同上,日本古版。

《楚辞集注》同上,《后语》第七、八卷,《附览》二卷,明蒋之翘,明版。

《楚辞集注》八卷《后语》六卷,庆安四年刊。

《楚辞集注》同上,日本版。

《楚辞集注》八卷明版。

【特】《楚辞集注》同上,明吴讷校,明版。

《楚辞集注》《八十四家评点》二卷,《总评》一卷,明版。

书名前标有“特”字的为“特别书”(即“善本”)。很明显,这十种书中并没有姜先生著录的“宋庆元四年戊午刻本”,两部善本也仅是明版。姜先生未去过日本,自然无缘寓目难得一见的《内阁目》,只能依据转抄本抄录(姜先生所据何本,今已无从查考)。“安”、“元”二字形近,印刷模糊时很容易混淆,转抄者只知我国年号而不知日本年号,很有可能将第六条的庆安四年(1651)本误记

①姜亮夫:《楚辞书目提要》,第42页。

②方继孝:《胡适先生手迹背后的故事》,《收藏·拍卖》2012年第4期,第46页。

③日本国会图书馆网站影印大正三年《内阁目》:<http://dl.ndl.go.jp/info:ndljp/pid/941622> [引用时间:2014-3-1]。

为宋庆元四年本,“戊午”二字则应是误书了年份之后所增的。姜先生限于当时客观条件无法核对原书,才致沿袭此误。

值得顺带提出的是,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姜亮夫全集》重排了《楚辞书目提要》,其中《集注》条目对庆元四年本的著录,与前文所引用的1961年初版有所不同,《全集》该条目作:

宋庆元四年戊午刻本。日本大正三年《内阁目》。叶八行,行十九字,白口双栏,附门人杨揖跋。^①

此处竟然多出了一句行款著录,令人生惑。《内阁目》并不著录书籍的行款,这句行款又是从何而来呢?日本庆安四年本《集注》现藏于日本大阪大学怀德堂文库,行款为半叶九行,行十八字,无跋文^②。因此,这句行款显然不是针对庆安四年本而补充的。据了解,《楚辞书目提要》初稿成于1933年,随后陆续有补订,1961年作为《楚辞书目五种》之一初刊于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即前文所引用之本)。1993年,又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崔富章先生《楚辞书目五种续编》,对庆元四年本条目并无增补。《全集》则系近年出版,时姜先生辞世已久,多出的一句是如何混入的已不得而知。据笔者一一核对,发现与此行款相符的《集注》版本,实为嘉定四年杨揖同安郡斋刻本,现有残卷藏于台湾“国家图书馆”,仅存《辨证》二卷,其书影见下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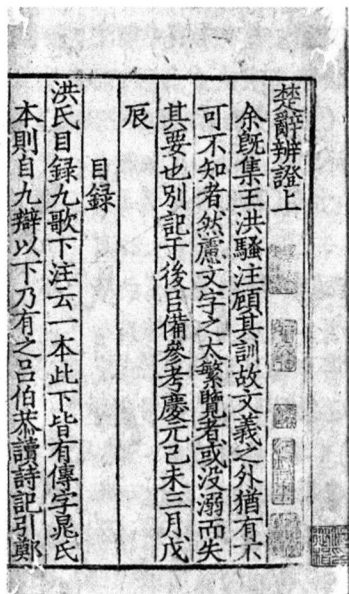


图1《辨证》首页,有朱熹自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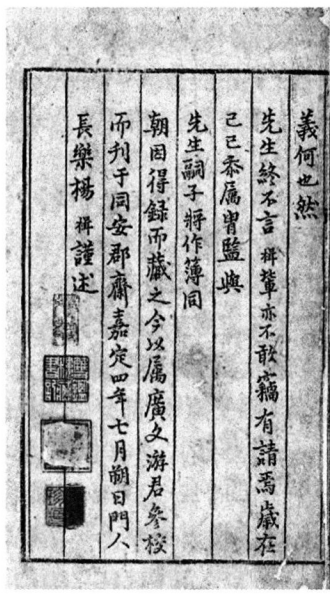


图2《辨证》末页,有杨揖跋文

①姜亮夫:《姜亮夫全集》第5册,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47页。按,《全集》非善本,文字错误、标点断句不当处甚多,如本句“杨揖”即误作“杨辑”,此据初刊本校改。

②崔富章:《楚辞书录解题》,第79页。

台湾所藏的这部嘉定四年本为半叶八行,行十九字,左右双栏,白口,单鱼尾,有杨楫跋。显然,《全集》中庆元四年本下多出的行款,描述的是这部嘉定四年本,然而这益加给读者一种庆元四年本确实存在的印象。

二、《中兴馆阁书目》未载《集注》

再看看《中兴馆阁书目》对《集注》版本的记载。陈騤虽与朱熹同时,但经过考察不难发现,《中兴馆阁书目》根本不可能著录朱熹《集注》。

李心传(1167-1244)《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云:

《中兴馆阁书目》者,孝宗淳熙中所修也。高宗始渡江,书籍散佚……至是数十年,秘府所藏益充初。乃命馆职为《书目》,其纲例皆仿《崇文总目》焉,《书目》凡七十卷。秘书监陈騤领其事,五年六月上之。^①

王应麟(1223-1296)《玉海》也说:

淳熙四年十月,少监陈騤等言乞编撰书目,五年六月九日上《中兴馆阁书目》七十卷、《序例》一卷……闰六月十日,令浙漕司摹板。^②

可知,《中兴馆阁书目》成书于宋孝宗淳熙五年(1178)。既然朱熹《集注》和《辨证》分别成书于宋宁宗庆元四年(1198)和五年,《中兴馆阁书目》显然不可能著录二十年之后的书。

《中兴馆阁书目》久已散佚,今之传本为民国赵士炜的《中兴馆阁书目辑考》(以下简称“《辑考》”),其实是一部辑佚之作,书中朱熹《集注》条目全文如下:

朱熹《楚辞集注》八卷、《辨证》二卷、《后语》六卷。据《书录解题》补卷数

原释:晁补之集《续》、《变》二书各二十卷,熹刊补定著五十二篇,为《楚辞后语》。《玉海》五四

按:《辨证》,《宋志》一卷,今本亦二卷(引者注:当为“一卷”)。《后语》,《宋志》未著录。^③

此处《辑考》的辑佚来源是《玉海》。检《玉海》卷五十四“艺文”之“《楚辞》”条(限于篇幅,部分引文只保留首句,原文空格以“□”符号表示):

《史记》屈原传:“原名平……”□《汉·地理志》:“楚屈原被谗……”□《汉·艺文志》:屈原赋二十五篇,唐勒四篇,宋玉十二篇。□《汉》传:“淮南王安……”□朱买臣……□宣帝召能为楚辞……□扬雄……

①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卷四,中华书局,2000年,第114页。

②王应麟:《玉海》卷五十二,《中华再造善本》影印元后至元六年庆元路儒学刻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6年。

③赵士炜:《中兴馆阁书目辑考》卷五,《古逸书录丛辑》本,国立北平图书馆,1933年,第1页上。

□班固……□王逸……□梁竦……□应举……□《文心雕龙》……□《隋志》楚辞十部二十九卷。王逸至刘杳。宋何偃删逸《注》十一卷，亡。皇甫遵训《参解》七卷。又《楚辞音》各二卷。余见《唐志》……□《唐志》集录楚辞类七家七部三十二卷：王逸《注》十六卷《隋志》十二卷；郭璞《注》十卷《隋志》三卷；杨穆《九悼》一卷；刘杳《离骚草木虫鱼疏》二卷；孟奥、徐邈、僧道鸾《音》各一卷乐类《离骚谱》一卷。□《中兴书目》楚辞九家九十四卷。□宋朝黄伯思《翼骚》一卷伯思曰：屈、宋诸骚皆书楚语、作楚声、纪楚地、名楚物，故谓之《楚辞》。□洪兴祖《补注》十七卷《考异》一卷。□黄铢《协韵》一卷。□朱熹《集注》八卷《辨证》二卷。□晁补之集《续》、《变》二书各二十卷，熹刊补定著五十二篇，为《楚辞后语》。^①

其中“《中兴书目》楚辞九家九十四卷”，与后文黄伯思以下家数、卷数显然不合，而赵士炜却完全忽视了这一矛盾，直接将黄伯思、洪兴祖、黄铢、朱熹四家三十六卷视作《中兴馆阁书目》楚辞类的原文辑入《辑考》中^②。事实上，《玉海》中“《中兴书目》楚辞九家九十四卷”句后有一空格，则“宋朝黄伯思”以下的内容很有可能只是王应麟按照时间顺序的补叙，而不是《中兴馆阁书目》的原文，且“宋朝”原本应作“本朝”，王应麟无称“宋朝”之理，“宋”字当为后代刊刻者所挖改。

那么，《中兴馆阁书目》究竟著录了哪些楚辞类著作呢？我们知道，《中兴馆阁书目》是《中兴四朝国史·艺文志》编修的基础，而后者又是《宋志》的重要文献来源，因此今人完全可以依据《宋志》来反推《中兴馆阁书目》的著录概况。检《宋志》，楚辞类共十二家一百零四卷：

《楚辞》十六卷，楚屈原等撰。

《楚辞》十七卷，后汉王逸章句。

晁补之《续楚辞》二十卷，又《变离骚》二十卷。

黄伯思《翼骚》一卷。

洪兴祖《补注楚辞》十七卷、《考异》一卷。

周紫芝《竹坡楚辞赘说》一卷。

朱熹《楚辞集注》八卷、《辨证》一卷。

黄铢《楚辞协韵》一卷。

《离骚》一卷，钱杲之集传。

《中兴馆阁书目》成于淳熙五年（1178），它可能著录的楚辞类著作，应是《宋志》中淳熙五年以前的部分，即屈原至周紫芝（1082-1155）共六家九十三卷。

①王应麟：《玉海》卷五十二，《中华再造善本》影印元后至元六年（1340）庆元路儒学刻本。

按，其他版本之《玉海》（如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清嘉庆十一年江宁藩署本）的空格情况均与此版本同。

②赵士炜：《中兴馆阁书目辑考》卷五，第1页下。

考虑到《宋志》是删并宋代四种官方书目而成,《中兴馆阁书目》只是其中的一种(因此上文所引《宋志》体例和排序均十分混乱,如《楚辞协韵》实际是朱熹的作品,是朱熹绍熙元年(1190)二月以黄铫(1131-1199)之名“刻在漳州”的^①,钱杲之《离骚集传》刻于庆元四年前,略早于《集注》^②,二人著作应排在周紫芝之后、朱熹之前),而目录卷数的实际演变往往比较复杂,“六家九十三卷”只能是大概的数字,和《玉海》中的“九家九十四卷”难免有所出入,《玉海》中的“九家”亦或是“六家”形近之讹。

总之,因《中兴馆阁书目》成书早于《集注》,《玉海》中有关《集注》的记录,不可能来自《中兴馆阁书目》,后者并不能作为《集注》早期传播源流的依据。赵士炜《辑考》误辑了此段文字,导致包括《楚辞书目提要》在内的众多楚辞目录著作都将“《中兴馆阁书目》”列为《集注》的后世目录著录项,这显然是不太妥当的。至于王应麟提到的这部《集注》,是一个有《辨证》而无《后语》的早期版本,实际上正是下文将要考证的嘉定四年杨楫刻本。

三、嘉定四年杨楫刻本是《集注》的初刻本

既然大正三年《内阁目》没有著录庆元四年本《集注》,《中兴馆阁书目》不可能著录《集注》,则所谓的庆元四年本实际是不存在的。据笔者查考,后世目录典籍著录《集注》较早的还有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曰:“《楚辞集注》八卷、《辨证》二卷。侍讲建安朱熹元晦撰。”^③赵希弁《郡斋读书附志》卷下曰:“《楚辞集注》八卷、《后语》六卷、《辨证》一卷。右朱文公所定也。”^④《直斋书录解题》成于宋理宗嘉熙二年(1238)左右,赵希弁为晁公武《郡斋读书志》所作的《附志》成于宋理宗淳祐九年(1249),则《直斋书录解题》实为最早著录《集注》的目录典籍。从陈振孙的解题未及《后语》可知,他著录的版本应是《集注》、《辨证》合刊本,我们推断这一版本应是嘉定四年本,而这一版本就是《集注》的初刻本,依据有三:

一、因党禁森严,《集注》在嘉定四年前刊行风险极大。朱熹晚年作《集注》,直到临终,一直处于党禁、学禁的阴霾笼罩之下。据束景南先生考证,庆元四年十一月,门人王岷曾经请求续刻朱熹文集(党禁之前的淳熙、绍熙间,朱熹文集曾有刊刻),朱熹称王岷是“后生未更事,不识时势,不知此是大祸之机”,然而得知王岷已刻出《后集》书板三册,遂急嘱刘季章说:“向日石刻及今所刊三册,劝其(引者注:王岷)且急收藏,不可印出,向后或欲更为此举,千万痛止

①束景南:《朱熹年谱长编》(增订本),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975页。

②钱志熙:《〈离骚集传〉作者里籍家世考》,《中国典籍与文化》2010年第1期,第14页。

③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十五,中华书局,1985年,第412页。

④孙猛:《郡斋读书志校证》,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1166页。

之也。”^①可见,朱熹晚年畏于党禁,禁止门人刊刻其著作。朱熹去世后,党禁开始松弛。从宋宁宗嘉泰二年(1202)到嘉定元年(1208),赵汝愚、朱熹陆续得到追复,庆元党人也纷纷官复原职,然而“伪学”并没有得到平反,朱子学依旧未获得合法地位。直到嘉定二年十二月,朝廷追谥朱熹为“文”,才“为彻底解除庆元学禁打开了突破口”^②。三年五月,朝廷又追赠朱熹中大夫、特赠宝谟阁直学士。嘉定四年是“嘉定更化”的关键一年,该年四月朱熹弟子、国子司业刘燾(1144-1216)上疏“乞开伪学禁”,请刊朱熹《四书》于太学^③,十二月,著作佐郎李道传(1170-1217)也奏请崇尚正学。嘉定五年三月,朝廷将朱熹的《论语集注》、《孟子集注》列于学官,朱子学开始官学化,伪学之禁终得以彻底平反。可见,杨楫在嘉定四年七月刊刻《楚辞集注》符合当时党禁解弛的情势^④,而在嘉定四年之前恐无这样做的可能。此外,笔者利用数据库遍检朱熹《文集》、《语类》、《年谱》以及其门人著作,发现朱熹在世时从未谈及《集注》成书,也并未提到《集注》付梓之事,可见这一部寄托了朱熹晚年情感世界的重要著作在其生前确实未能流传。

二、嘉定四年本杨楫跋文具有鲜明的初刻本跋文色彩,其文曰:

庆元乙卯,楫自长溪往侍先生于考亭之精舍。时朝廷治党人方急,丞相赵公(引者注:赵汝愚)谪死于道。先生忧时之意屡形于色。忽一日,出示学者以所释《楚辞》一编……岁在己巳,忝属胄监,与先生嗣子将作簿(引者注:朱在)同朝,因得录而藏之。今以属广文游君参校而刊于同安郡斋。嘉定四年七月朔日,门人长乐杨楫谨述。

杨氏通篇都在介绍朱熹因赵汝愚谪死事件而注《楚辞》,以及自己从朱熹第三子朱在(1169-1239)处获得书稿并终于校勘、刊刻的故事。可见,杨楫在嘉定四年刻《集注》时,所用底本即是朱熹书稿,他并未看到任何更早的《集注》刊本。

三、朱熹之子朱在刻《后语》时未提及更早的《集注》版本。今天最常见、也是被学者普遍引用的《集注》版本是端平二年(1235)本(附《辨证》、《后

①束景南:《朱熹佚文辑考》,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562页。

②王宇:《从庆元党禁到嘉定更化:朱子学解禁始末考述》,《国际社会科学杂志》2011年第4期,第87页。

③刘燾:《辛未四月奏请乞开伪学禁上殿奏札》,《云庄集》卷一,明正统九年(1444)刘稳云庄书院刻十二卷本。按,现存刘燾《云庄集》有十二卷本、二十卷本,《四库全书总目》著录其十二卷本,实际抄录二十卷本,然二者皆为伪书(取真德秀《西山集》诗文伪充),仅十二卷本存有少量刘燾原作(说详梁庚尧:《刘燾〈云庄集〉的版本及其真伪》,《书目季刊》第8卷第2期,第29页;蔡东洲:《〈云庄集提要〉辨证》,《四川师范学院学报》1991年第4期,第68页)。而此奏札见于《宋史·刘燾传》,其事亦见于史籍,故应为原作。

④杨楫在嘉定四年七月刊刻《集注》,颇有声援刘燾等人的可能。

语》),其中《集注》、《辨证》部分的祖本即嘉定四年本,而《后语》部分的祖本则是嘉定十年朱在整理本。嘉定十年本已佚,但朱在所作跋文保存在端平二年本中:

先君晚岁草定此编,盖本诸晁氏《续》、《变》二书,其去取之义精矣,然未尝以示人也……嘉定壬申仲秋,在始取遗稿,誊写成编……又五年,岁在丁丑,补外来守星江,实嗣世职,既取郡斋所刊《楚辞集注》,重加校定,复并刻此书,庶几并行,且以识予心之悲也。中秋日,在谨记。^①

朱在所说的“此编”、“遗稿”,是朱子临终仍在修订的、以晁补之《续楚辞》、《变离骚》为基础编写的《后语》。朱在刊刻《后语》时,曾取来嘉定四年杨楫所刻同安郡斋本《集注》(含《辨证》),做了一些校定工作,希望杨楫之书与自己所刻的《后语》“庶几并行”,他没有提到其他更早的《集注》版本。

以上线索均表明,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著录、今台湾“国家图书馆”收藏的嘉定四年杨楫刻本,是《集注》、《辨证》的首次合刻本,同时也应是《集注》的初刻本。《集注》的成书和刊刻,是“庆元党禁”到“嘉定更化”这一特殊历史时期朱子学境遇发生改变的直接反映。因此了解《集注》成书、刊刻的真实过程,对于楚辞学史研究和朱子学研究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作者简介】唐宸,男,浙江大学古籍研究所、台湾中山大学中文系 2013 级联合培养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先秦礼学、版本目录学。

^①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编:《朱子全书》(修订本)第 19 册,第 312 页。